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礼乐文化 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



夏
静
著

三代以来以礼乐、“三才”和阴阳五行为核心的知识系统，属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公共话语”，它们与历史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总是作为稳定的思维范式、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制约着广义的文化创造过程。本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礼乐文化的知识谱系及精神品格与古代文论的相关处进行较为深入的历史文化考察，尝试从礼乐文化所孕育的原初范畴中去寻绎与文论次生范畴的关联，通过对两者相通处的梳理，以照见中国文论自孕育期以来所蕴涵的文化基因及源流统绪之精神方向。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礼乐文化 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

夏 静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夏静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9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5876 - 5

I. 礼… II. 夏… III. 礼乐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7103 号

书 名 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

著 者 夏 静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876 - 5

定 价 38.00 元

前 言

考察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到,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演进,一方面来自于文学内部的传承,另一方面,更受制于思想传统的强大控制力量,尤其在文学观念尚未独立的先秦两汉时期。这是许多重要文论命题的原生时期,文学思想的形成走的是一条没有外来文化影响的原生道路,这与魏晋以后所呈现的多元并进的发展形态是完全不同的。文学观念最初作为文化思想的附庸而发端,历经了由广义到狭义、由素朴到精致、由文学外部到内部、由无意为文到有意为文的发展过程。因为这些文论命题都是适应其时的历史文化情境而生的,因此,对文论思想所依存的历史文化情境的瞭望,就相当重要了,而这个历史语境,就是礼乐传统。

礼乐传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之精义所在,影响了自三代以来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逮至儒学思想浸淫的当代“儒家文化圈”,在制度和心理层面上,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礼乐传统涵盖了从典章制度到精神信仰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外显的联系如政教的典仪式文,还是内隐的联系如心理的“六艺”之教,均为礼乐文化之载体。礼乐概念具有非常宽泛的含义,抽象而言,上则表现为天道的变化,下则反映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中则体现为人事变化的法则。具体而言,涵盖了社会的观念心态、风俗习惯、典章制度、名物器具以及个体的行为规范、道德教化等各个层面,几乎囊括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母体。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视中国古代文化为礼乐的产物,文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

古代文学思想之形成,不仅是对文学存在的反思判断,更涉及丰厚的历史文化经验及价值意义。文学艺术自产生伊始,就有关于文学的看法,虽然这些看法最初是朦胧的、非自觉的,常常隐含在诸如人生、哲学等问题的探讨之中。古人关于文学的种种见解,不管相同或

互异,几乎都是围绕思想文化在当时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言的,常常并非针对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提出的解答。在古代思想家的文化视野中,人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才是本质的问题,文学的问题并非本源性的问题而只是衍生性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采取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把视线仅仅集中在审美性、艺术性等现代的文学关照的范围内,那么就很难准确把握中国文论的发生特征,亦会使其丰富的内涵简单化、窄义化。

古代文论的早期形态研究,包括了文论发生期的元范畴、元命题以及内蕴的思维范式、深度意义等,是构成文论整体知识系统的组结点和意义架构,把握了文论的早期形态,就能够对其知识状况、知识宗旨以及知识效应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本书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意识及主要文论范畴进行清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礼乐传统的知识谱系及意识形态品格与古代文论的关联进行较为深入的历史文化考察,并尝试从礼乐传统所孕育的原初范畴中去寻绎与文论次生范畴的关联,通过对礼乐传统与文论发生特征的相通处的梳理,以照见中国文论自孕育期以来所蕴涵的文化基因及其源流统绪之精神方向。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礼乐研究述论	1
第一节 旧学时期	2
第二节 新学时期	8
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内容、方法	13
第二章 礼乐之思想谱系	18
第一节 “三才”论	19
第二节 阴阳五行论	28
第三节 文论之维	38
第三章 礼乐之知识谱系(上):乐	44
第一节 乐源论	45
第二节 乐之意识形态品格	54
第三节 乐教与中国文化精神	63
一 乐教之为“六艺”先	63
二 诸子乐教理想	66
三 以雅为正	70
第四章 礼乐之知识谱系(中):礼	74
第一节 礼源论	74
第二节 礼之宗教品格	79
第三节 礼教与中国文学精神	87
一 礼教之人文化成意义	87
二 宗法伦理与中国文学精神	91

三 情性与中国文学精神	94
第五章 礼乐之知识谱系(下):诗	99
第一节 诗源论	99
第二节 诗之政教品格	106
第三节 诗教与中国文论精神	117
一 孔子诗教及若干范畴	118
二 汉代诗教对文论影响	126
第六章 礼乐发展与思想文化之演进	133
第一节 礼乐发展三阶段	133
一 “制礼作乐”	133
二 “礼坏乐崩”	136
三 “礼乐复兴”	139
第二节 礼乐背景下的学术传统	142
一 诸子之学	142
二 “六艺”之学	148
第三节 礼乐背景下的历史传统	153
一 鉴识与承传	153
二 三代情结与复古思维	158
第七章 礼乐之思维构型——象	164
第一节 象之渊源	165
第二节 “象喻”思维	175
第三节 象与中国文论传统	184
一 文源于象	184
二 以象比德	189
三 象之元范畴意义	193
第八章 礼乐之文化基因——文	198
第一节 文之渊源	198
第二节 “尚文”意识	211
第三节 文质与中国文论传统	219
一 文质三论	220
二 文质之元范畴意义	229

第九章 礼乐之精神品格——和	236
第一节 和之源流	237
第二节 “尚和”思维	249
第三节 中和与中国文论传统	259
一 “尚中”意识	259
二 中和之义	262
三 中和之元范畴意义	267
结 语	273
参考文献	275

第一章 礼乐研究述论

礼乐研究,极为浩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主要是指围绕“三礼”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肇始于孔子,鼎盛于汉儒,源远流长,盛而不衰,这在“六经”研究中居于重要位置,是传统儒学及经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历代学者从音韵、文字、训诂、订补、校勘、辨伪、辑佚等角度进行原典考证,以及礼学流派、传承及演变的研究,因此主要是基于事实判断基础上的还原性研究;广义则包括礼乐之载体——“六经”的阐释性研究,礼乐本乎天,贯通群经,讲天地变化之道的为《易》,讲历史典制的为《书》,讲政教兴废的为《雅》、《颂》,《春秋》则为礼义之大宗,故《汉书·礼乐志》云:“《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颜师古注《六经》为:“《易》、《诗》、《书》、《春秋》、《礼》、《乐》。”即“六经”之道同归于礼乐。因此以“六经”为主体的传统礼乐研究,实际上涵盖了经学研究的核心部分,是中国传统学术价值本原之所在,这主要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基础上的信仰认同。广义的研究作为古人对宇宙世界、社会人生所持的一种基本判断标准,因其构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古人的生存状态与信仰世界,故而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史上长久地发挥着精神支柱的作用。

从礼乐研究的内容看,分为礼学和乐学两个部分。礼学研究,或传注笺疏、或考索典章制度、或研讨名物度数,代有著述,成果丰硕,难以计数。与之相比,乐学研究则存在严重的不足,究其根源,大致有三:其一,“乐”无经。对此,历代学者有两种解释。一种以为《乐经》亡,唐人徐坚《初学记》云:“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一种以为《乐》本无经,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云:“《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中。”其二,在旧学时代,礼乐合一言礼,清人朱彬《礼记训纂》云:“‘六经’其教虽异,以礼为本。”从孔子以来的儒者用一个“礼”字总括传统文化,礼学与广义上的文明或文化乃同一

概念,因而传统礼学常常包含礼学与乐学。其三,新学研究时期,受西学专业划分以及相应知识工具的限定,乐学研究主要局限在史学和艺术研究领域。如史学领域有王国维早年的《释乐次》、顾颉刚、魏建功等在《古史辨》中的辩论、高亨、阴法鲁等对周代《大武》的讨论;艺术领域有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孙景琛、彭松、董锡玖、王克芬合著《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等等。对于乐本身知识谱系的梳理,如乐舞起源、乐歌的制定与分离、乐器的发展、雅俗乐与礼制之关联等等,少有涉及,至于乐教所衍生的知识权利,包括宗法、等级的象征秩序以及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品格方面的研究则基本上是空白。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涉足此一领域研究,如修海林《古乐的沉浮》、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等等,但相对于礼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而言,仍是远远不够的。

单从时间上看,礼乐研究历史不仅早于儒学与经学的研究历史,而且在两千年的发展中,随着儒学及经学研究的兴衰更替而成为传统学术中的一门显学。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对三代礼乐的研究,并形成礼经学和礼制学两条主轴。以晚清为界,礼乐研究可分为旧学与新学两个时期,其间亦存在着新旧过渡时期,这是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崩溃与现代学术传统的建立同步的。旧学时期,礼乐研究的命运受制于存在的社会基础(宗法、伦理)、社会功能的嬗变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所形成的政教价值取向的影响;新学时期,如果我们悬置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则此一时期多受到出土材料和新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多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研究。本章将主要分析这两个时期礼乐研究之主要方法、特点和成果,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和尚需要着力开拓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就本文将要展开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作一个展望。

第一节 旧学时期

旧学时期的礼乐研究,主要是历代学者对“三礼”经义和礼制的研究,以及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理论性阐发,如荀子及北宋李觏的礼论等。从整体特征上看,旧学时期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和历史阶段性特征。所谓经世致用表现为,历代礼乐研究总是追随政治权力的取向而论经证义,最终目的在于通经致用,故而歧见百出、矛盾重重;所谓历史阶段性表现为,礼乐研究随着历代经学研究的发展,

在历史形态和工具范式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有“儒者沿波,学凡六变”的论断。根据历代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两汉——形成和鼎盛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元明——兴衰和更迭时期、清代——重振时期。本节先总陈历代之研究成果,然后以历史阶段分而叙之。

礼乐的研究成果,在历代的艺文志或书目类书中都有记载,试举其大略:

《汉书·艺文志》录:礼部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乐家六家,百六十五篇。

《隋书·经籍志》录:礼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乐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史部仪注类五十九部,二千二十九卷。通计亡书,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录:礼一百四部,周礼十三家,仪礼、丧服二十八家,礼论答问三十五家,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史部仪注八十四部,一千一百四十六卷;乐二十九部,一百九十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录:礼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乐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

《宋史·艺文志》录:礼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乐一百一十一部,一千七卷。

《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分六个子目: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其中周礼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仪礼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礼仪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三礼总义六部、三十五卷;通礼四部,五百六十三卷;杂礼五部,三十三卷;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乐类存目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内四部无卷数)。

礼乐制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具体的礼典制定与纯学术性的古礼考辨。秦汉以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要根据三代传统与礼治实践来制定本朝的礼乐制度,形成礼典以备施行,如宋嘉祐年间的《太常因革礼》、政和年间的《政和五礼新仪》、唐开元年间的《大唐开元礼》、明洪武年间的《明集礼》、清乾隆年间的《钦定大清通礼》、民国《北议礼录》等官修礼制。以《大唐开元礼》为例,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官

修礼典,共一百五十卷,六十余万言,按照“五礼”之“吉、宾、军、嘉、凶”顺序,分皇帝、皇室成员、三品以上、四品五品、六品以下五个档次,撰述礼文。《开元礼》法本《周礼》,集汉晋以降礼制纂修之大成,确立了中古以来仪制法典化的基本构架,故《新唐书·礼乐志》赞曰:“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除官修以外,还有私家编纂的礼书,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冠、婚、丧、祭等日用伦常的家礼、乡礼等,如宋人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朱熹《朱子家礼》、明人王守仁《南赣乡约》、黄佐《泰泉乡礼》等等。无论官修、还是私纂,都旨在藉礼制的制作、修订来规范、指导现实生活中的礼仪活动,具有明确的事功目的与实践价值。与礼典的制定不同,纯学术层面的研究则着眼于搜辑考订,如唐人杜佑《通典》中《礼典》一百卷、《乐典》七卷、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中《郊祀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二十一卷、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七十五类,等等,对于繁琐的名物、制度、礼节,明其沿革,究其礼意。以《通典》为例,凡二百卷,约一百七十万字,分八门,礼占卷帙之半,尽述唐以及唐以前历代礼制的沿革,四库馆臣评曰:“斟酌损益,首尾完备。”其考辨的主要目的在于学术而非资治。

以历史阶段而论,礼乐研究始于先秦。百年来出土材料与传世典籍的印证,业已证明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的成熟定型期,中国历史上确有“夏礼”、“殷礼”和“周礼”的存在,周礼则为三代礼乐之集大成。后世礼乐研究正是以三代制度为根基,以阐发礼乐文化精神为宗旨的一门学问。此一时期的研究留下了诸多争议极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结论成为经学研究的不同学派与师承的源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周公“制礼作乐”及“三礼”的形成,这是礼学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因其争论贯通了旧学和新学时期,笔者将其放在新学时期来探讨;二是诸子对于礼乐的研究。诸子之学兴起的背景正是春秋的“礼坏乐崩”,对于礼乐的研究总结受到了这一时代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在《左传》、《国语》、《论语》等典籍中,谈论礼乐的言论数不胜数。人们从各个层面讨论礼的起源与效用、礼制与礼治的关系、礼与仁的关系等等。与孔子同时或之前的思想家都有关于礼乐的研究,如子产、晏子、老子、墨子等,其中子产对周礼的哲学阐释以及晏子、老子、墨子对礼乐的思考,是礼乐研究发端时期的重要思想源头。当然,至为重要的还是儒家从信仰上的坚守到理论上的阐发。孔子思想的主体是以礼乐为知识背景而阐发生成的,其仁学本体论为礼乐教化思想

提供了一种文化哲学的基础,从而使其避免流于钟鼎玉帛的表面形式而具有更为深厚的理论生命力。孔子以后,儒家的礼乐传统一以贯之。战国时代的荀子有《礼论》、《乐论》专篇,洋洋洒洒,气势宏阔,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礼教、乐教的不同特点,对礼乐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形成了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其礼与法的结合,与孔子礼与仁的结合一样,成为后世礼乐研究的重要思想依据之一。

礼乐研究的鼎盛期在两汉,这是中国古代礼乐研究系统化、规范化、细密化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礼”之学大兴,并最终确立了经学地位。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三礼”的整理与传播,从制度层面上促使了汉代礼乐研究的鼎盛。郑玄破除门户,遍注“三礼”,构成了中国传统礼经学和礼仪学的脊柱。子学研究方面,思想家们研讨礼乐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大一统”寻求礼治秩序的合法性资源。西汉子学,从贾谊、董仲舒到班固、王符、荀悦等等,他们对礼与法、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述,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思想。与先秦研究所不同的是,此一个时期不再是“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并行,而是以经学研究为主,子学降到附属的地位;二是两汉“礼乐复兴”中方兴未艾的制度建设。汉代的礼乐制度建设始于叔孙通,其制礼定乐,活动全面,兼采古礼与秦礼,包括定朝仪、宗庙礼乐、宗庙仪法、天子服制等。从元帝到西汉末年,汉代礼乐在兴废之间拉锯,依托儒家经典,托故改制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导力量,此一趋势到王莽时期引发了一个新的高潮。东汉时期统治者仍致力于完善礼乐制度,章帝时期《白虎通》所确立的“三纲”,成为了传统时代礼乐研究中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汉代乐府有很大的发展,从武帝到成帝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其用途涵盖了礼乐政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

魏晋至明代是礼乐研究的兴衰与更迭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虽然极为兴盛,但出于门阀制度维护等级特权的需要,礼乐之学仍独炽不衰。鉴于丧服制度最能体现宗法社会之尊卑亲疏关系,故而南方六朝礼学以丧服学最为精密,在《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中,标明“丧服”者有五十部,占三分之一还要多。魏晋时期古文经地位上升,贾逵、马融、王肃等反对郑学,用古文注“三礼”,王肃在政治上联姻司马氏,使其礼学列于学官而夺郑学之位。北朝礼学偏重《周礼》,也颇为兴盛。据《北史·儒林传》记载熊安生“专以三礼教授

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惜未传世。北周文帝以《周礼》为立国之根本大法,这就直接影响了其后隋唐的礼乐制度,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唐朝国家昌盛,文教繁荣,礼学空前发展。太宗时修《贞观礼》,高宗时修《显庆礼》,玄宗时修《开元礼》,这三部礼书堪称古代礼制之大备。同时,唐代科举以九经取士,并以《礼记》为大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故学子多习《礼记》。唐初孔颖达、贾公彦所撰“三礼”义疏是钦定的科举范本,这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完成了对南北朝礼经学的总结。

宋代礼乐研究在政治风云与理学传统中各显沉浮。宋儒潜心理学,重在阐发义理,以理学悟礼意,庆历以后始兴疑古之风,排斥汉唐旧说,加之宋代积贫积弱,政治变革,图谋强盛乃两宋思想家重要的政治追求,遂有王安石废置《仪礼》,以《周礼》取士,撰《周礼新义》二十二卷,另有王昭禹撰《周礼详解》四十卷,易祓撰《周官总义》三十卷等,使《周礼》之学突起。与此相反,欧阳修、苏轼、苏辙多毁《周礼》,胡安国、胡宏父子亦反对王安石援《周礼》变法,这种状况一直延至南宋。朱熹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来构筑他的礼学体系,成为继孔子、荀子、郑玄之后,又一位重要的礼学传承人物。朱子礼学注重“践履”,所著《朱子家礼》,在明清两代传遍全国,是民间的通用礼。“三礼”之学至宋而微,元代除陈澧《礼记集说》外,无可称道者,至明几成绝学。在礼仪的订立上,宋代以后承续了自《开元礼》以来撰作“五礼”的传统,《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清通礼》是留存至今的代表性礼典。此外,家礼、书仪类著述在宋元明清大量出现,广为流传,成为礼仪学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流。这类著作基本上都是由士大夫或乡绅私人编纂,内容着重于冠、婚、丧、祭“四礼”及其它日常行为规范,故常以“四礼”为标题,如吕坤《四礼疑》和《四礼翼》、马从聘《四礼辑》、韩承祚《明四礼集说》等。这一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承续子学传统的礼论,如李世民《论礼乐》、白居易《议礼乐》、王安石《礼乐论》、真德秀《问礼乐》等,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清代礼乐研究受乾嘉学派大兴考据之风的影响,出现了一个重振时期,其时郑学地位得到进一步肯定,出现了一批带总结性的鸿篇巨作,在旧学研究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抹下最浓重一笔。在诸经新疏方面,完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版于1905年的《周礼正义》,凡八十六卷,二十三万字,是孙诒让积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该书博采宋

元明清诸家之说,疏通考证,折衷至当,乃集大成之作;胡培翬《仪礼正义》四十卷,补郑注之所未备,并以近儒之说附、订《注》;孙希旦《礼记集解》六十一卷,取郑注孔义,并取宋元以来诸儒之说,遵程朱理学解释礼意。在礼学通论方面,江永《礼书纲目》仿《仪礼经传通解》、徐乾学《读礼通考》特详丧礼、秦蕙田《五礼通考》特详吉礼,网罗众说,考古多于通今。另有邵懿辰《礼经通论》、朱彬《礼记训纂》、郭嵩焘《礼记质疑》等等。在专项考释及工具书方面,胡匡衷《仪礼释官》、江永《仪礼释官增注》、程瑶田《仪礼丧服足征记》、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军赋说》、戴震《考工记图》,都是考据派的代表作。工具书方面,有张惠言《仪礼图》、凌廷堪《礼经释例》等。清人的研究囊括各个方面,达到了传统礼乐研究的顶峰,故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礼教》中总结为:“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

总体而言,无论是汉学训诂、宋学义理还是清学考证,都没有摆脱传统礼学的总体框架,在思想方法、学术视野、知识工具及价值取向方面均存在局限性。正如台湾学者林素英所言:“清代以前,经学的研究,始终以名物制度、文字训诂为主流,因此传世者,多为注疏式的考究说明,即使民国以来,学者之研究方向亦多率由旧章,只有《易经》的研究较早走出故有的研究范围,进入哲学的讨论。至于《礼》的研究,则仍坚守自己的本位,期求从文字注疏中,使莘莘学子能确切掌握诂屈聱牙的经文要义。”^①这较为客观地揭示出礼乐研究受制于旧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而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滞后的缘由。上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就对传统礼学研究的路数颇有微议:“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得了。”他设想一种新的史学眼光和方法:“我们试换个方向,不把他当作经学,而把他当作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所以这门学问不必人人都学,自无待言。”^②这是“新史学”理论兴起以后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在类似意见的影响和指导下,礼乐研究在内容上产生了变化,在范式上开始转型。其间亦有沿袭旧学路数的,如黄侃的《礼学略说》、章太炎的《丧服依开元礼议》等,但这只是新旧嬗变

①林素英:《古代生命礼仪中的生死观——以〈礼记〉为主的现代诠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6页。

中的一些曲折而已,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古代礼乐制度的消亡,西方政制、法制以及现代人文科学观念和方法的兴起,传统礼乐研究的时代终告结束,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第二节 新学时期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在出土材料和西学范式的影响下,传统礼乐的研究开始进入了新学时期。胡适 1919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礼的观念凡经过三个时期:第一,最初的本义是宗教的仪节;第二,礼是一切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规矩;第三,礼是合于义理可以做行为模范的规矩,可以随时改良变换,不限于旧俗古礼。”^①这种对礼本质的理解,较之旧学时期的观念,已经有了质的不同。李安宅 1930 年出版《〈仪礼〉与〈礼记〉社会学的研究》一书,较早尝试从新的角度阐释古礼,他认为:“中国的‘礼’字,好像包括‘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制度”(institution)、“仪式”、“政令”等等,所以在社会学的已成范畴里,‘礼’是没有相当名称的,大而等于‘文化’,小而不过是区区的‘礼节’,……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②全书凡七章:第一章《绪言》提出“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第二章《礼》,就礼的本质、功用、行礼的资籍及理论进行论述;第三章《语言》从亲属称谓入手分析古礼;第四章《物质文化》、第五章《乐》、第六章《知识》、第七章《宗教与仪式》。作者颇为注意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结构和脉络来梳理古礼的本质与功能,略见系统建构,并且已经具有了中外比较文化的视野了。

1942 年朱光潜撰写《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③一文,在西学之伦理学、教育学与政治学、宗教学的知识背景下,以乐之和与礼之序建构儒家思想系统的核心,眼光独到,颇有新创之处。1947 年邓小琴《中国礼俗学纲要》和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问世,两者都提出研究“礼”离不开“俗”。邓著辨析了礼与俗的关系,

^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8 页。

^②李安宅:《〈仪礼〉与〈礼记〉社会学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4 页。

^③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七期,1942 年 2 月。

探讨了礼俗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中西礼俗的比较与礼俗变迁等问题,这对以后的礼俗研究有开启之功。1965年杨宽《古史新探》一书中包括了六篇论文,其中有《“冠礼”新探》、《“乡饮酒礼”与“乡礼”新探》、《“射礼”新探》等重要论文,作者将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物、民族调查资料结合起来,相互求证,颇多建树,是新学时期研讨古代礼制的典范之作。1979年有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和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问世。沈氏兼有传统礼学的深厚造诣和对历史、思想、制度的敏锐洞察力,其文对先秦礼典的实行情况与《仪礼》的撰作年代等一些争论千年的难题,进行了详密的考订。以上成果的问世,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礼乐研究的雏形,为古老的礼乐研究开出了一条新路。

新学时期的礼乐研究,师承明显。如曹元弼(《礼经学》)、沈文倬、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秦汉礼制研究》)师生三代,金景芳(《论宗法制度》)和其指导的研究生群体(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李衡眉《论昭穆制度》、王雅《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等),台湾学者高明(《礼学新探》)及其指导的研究生群体。他们在现代礼乐研究的传承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其研究本身亦可以看出新学发展演变与转型的轨迹。除此一类研究群体之外,较为有代表性的学者论著有: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台湾1983)、万俊吉《礼记之天地鬼神观探究》(台湾1985)、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1991)、苏志宏《秦汉礼乐教化论》(199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1992)、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1992)、张蕙慧《中国古代乐教思想论集》(台湾1992)、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1996)、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1996)、钱玄《三礼通论》(1996)和《三礼辞典》(1998)、华有根《西汉礼学新议》(1998)、黄宛峰《礼乐渊源〈礼记〉与中国文化》(1998)、邹昌林《中国礼文化》(2000)、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2001)、金尚理《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2002)、丁鼎《〈仪礼·丧服〉考论》(2003)、张岩《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2004)、刘正《金文庙制研究》(2004)、吴十洲《西周礼器制度研究》(2004)、刘源《殷周祭祖礼研究》(2004)、梅珍生《晚周礼的文质论》(2004)等等,这些成果为新时期礼乐研究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考察新学时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